

究竟誰毀了蘇聯？

• 鄭 驄

西元前524年單穆公的子母相權論是中國最早的貨幣思想。單穆公的論點是：如果物價上漲，幣值下降，國家應發行比原有貨幣面值更大的新幣；反之，如果物價下跌，幣值上升，則國家應發行比原有貨幣面值更小的新幣，讓新幣為子，舊幣為母，兩者同時流通。

蘇聯解體已經六年了，總還有人以之為例，念念不忘反對西方的和平演變。本文關心的是：真的是西方政府見死不救，不給經濟援助，從而毀了蘇聯麼？真的是西方的經濟學家別有用心，亂出主意，從而毀了蘇聯麼？如果說不給經濟援助是為了和平演變，那麼請問，現今的俄羅斯是非共產國家，現今的中國大陸是共產國家，為甚麼世界銀行迄今連續四年把貸款的最大部分給了中國大陸，而不是俄羅斯^①？可見，經濟援助與和平演變無關，而取決於申請國自身的經濟狀況。如果有人說蘇聯政府經濟觀念與經濟政策的錯誤是由於受了西方經濟學家的有意指使，那麼我們更可以說是受了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單穆公——的有意指使。

一 一個古代的錯誤

西元前524年單穆公的子母相權論是中國最早的貨幣思想。據《國語·周語》^②：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單穆公的論點是：如果發生天災，影響物價，從而影響幣值，國家就應採取相應措施。如果物價上漲，幣值下降（所謂的「輕」），那麼，買同樣一件商品現在就需要更多的貨幣，而攜帶貨幣增多，令人不便交易，則國家應發行比原有貨幣面值更大的新幣（即「重幣」），讓新幣為母，舊幣為子，兩者同時流通；反之，如果物價下跌，幣值上升（所謂的「重」），那麼，買同樣一件商品現在就需要更少的貨幣，而分割貨幣，亦令人不便，則國家應發行比原有貨幣面值更小的

新幣(即「輕幣」)，讓新幣為子，舊幣為母，兩者同時流通。現景王發行重幣而廢除舊幣，會使人民蒙受財產損失，進而不利民心。

這裏我們應注意，當時的貨幣並非紙幣，亦無主幣與輔幣之分，所以有攜帶與分割的問題。這是單穆公關心之所在。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交易進行，他建議兩幣並行。他與周景王的分歧在於，他贊同景王發行重幣，但反對同時廢除舊幣。最後景王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仍然發行了重幣。那麼，單穆公與周景王究竟誰對誰錯呢？

如果用現代經濟學語言來分析：根據貨幣數量論，有：

$$(1) \quad M \times V = P \times Y$$

這裏： M 是貨幣總量， V 是貨幣流通速度， P 是物價水平， Y 是社會總產出。對(1)全微分後，可得：

$$(2) \quad M \times dV + V \times dM = P \times dY + Y \times dP$$

就長期而言，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定量，所以 $dV = 0$ 。從(2)可得：

$$(3) \quad dM / M = dY / Y + dP / P$$

由(3)可改寫為：

$$(4) \quad dP / P = dM / M - dY / Y$$

此式表明：通貨膨脹率等於貨幣增長率減去總產出增長率。

現在用(4)來分析單穆公的觀點：

首先，在通貨膨脹($dP > 0$)的情況下(比如由於天災人禍使 $dY < 0$)，物重錢輕，幣值下降，為了阻止通脹，此時就應減少貨幣發行，讓 $dM < 0$ 。這時，為降低交易成本而發行重幣的同時就應收回一部分舊幣，保證 $dM < 0$ 。相比之下，如果按照單穆公的主張：發行重幣的同時還保留全部的舊幣，則會使 $dM > 0$ ，這樣雖然方便了交易，卻會進一步惡化通貨膨脹。

其次，在通貨緊縮($dP < 0$)的情況下，物輕錢重，幣值上升，為了解決通貨緊縮，此時就應增加貨幣發行，讓 $dM > 0$ 。這時，單穆公既發行輕幣又不廢舊幣的辦法是可行的，而且這樣既方便了交易又紓解了通貨緊縮之困苦，可收一石二鳥之效。所以，單穆公之論是正誤參半，後人不可不察。

至於周景王之為，則難以斷定。據《漢書·食貨志》：「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弗聽，卒鑄大錢。」由此雖可知道當時是通貨膨脹的情況，但無論是《國語》還是《漢書》，都未說明周景王發行重幣時是否廢除或收回舊幣。

由此可見，通貨是否膨脹主要取決於貨幣數量，而貨幣面值的大小則只涉及到流通，所以，僅在母幣上做文章是無法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單穆公沒有認清這一點，我們並不怪他，因為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貨幣經濟只是雛型方成。可是，令人遺憾的是，經過了人類在這二千五百多年對貨幣的研究與認識，今天還會有人犯同樣的錯誤。這個犯錯者就是前蘇聯政府，這個錯誤就是其1991年貨幣改革的方法。

二 一個現代的錯誤

1991年1月22日21時，蘇聯中央電視台播發了戈爾巴喬夫根據帕夫洛夫內閣建議而發布的總統令，宣布所有面值為50盧布和100盧布的大面額紙幣從1月23日零時起無效，限3天內交銀行兌換小面額盧布。而且一般人限換平均月工資額(當時一個工人的

1991年1月22日21時，蘇聯宣布所有大面額紙幣從1月23日零時起無效。根據官方說法，這一政策的目的是打擊地下經濟，但是真實目的是通過取消大額紙幣來減少貨幣總量。為甚麼蘇聯要減少貨幣總量呢？因為與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蘇聯存在着貨幣過量的問題。

月工資在300盧布左右)，最高不得超過1,000盧布，退休者限換200盧布，超過限額的要向特別委員會證明其來源合法。同時私人的銀行存款被凍結，每人每月只可提取500盧布。

根據官方說法，這一政策的目的是打擊地下經濟。但是這種說法顯然不能自圓其說：地下交易的確會使用大額紙幣，但使用大額紙幣的交易不全都是地下交易。黑市的存在是因為官市受到了政府的干預和管制，沒有了大額紙幣黑市照樣會存在，我們甚至可以在二次大戰後的許多國家中看到完全不靠貨幣而靠以物易物的黑市存在。所以，這一政策的真實目的是通過取消大額紙幣(或者說「母幣」)來減少貨幣總量。

為甚麼蘇聯要減少貨幣總量呢？因為與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蘇聯存在着貨幣過量(money overhang)的問題。對於上面(1)式，我們可將其改寫為：

$$(1') \quad M = (P \times Y) / V = P \times Y \times K$$

此處，讓 $K=1/V$ ， K 是現金餘額系數。對(1')全微分後變形得到：

$$(2') \quad dP/P + dK/K = dM/M - dY/Y$$

在政府對市場價格基本上不干預的情況下，通貨膨脹能公開表現出來。而現金餘額系數主要取決於消費者習慣，長期可看作為定量，所以有 $dK=0$ ，(2')式就變形為(4)式，這種情況稱為公開通貨膨脹(open inflation)。

如果由於公有制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商品供不應求，政府往往會控制市場價格，不讓其上漲，即 $dP=0$ ，而用非貨幣票證(比如糧票、肉票)來配額供應商品，這時那些由於沒有非貨幣票證而無法使用的貨幣就會變成現金餘額，不斷地在人民手中積累，形

成貨幣過量，這種情況稱為隱形通貨膨脹(repressed inflation)。即：

$$(3') \quad dK/K = dM/M - dY/Y$$

而經濟制度轉型的過程就是轉公有制為私有制，恢復市場功能的過程，也就是由(3')式轉為(4)式的過程。

這裏，政府放棄對市場價格干預的途徑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上述(2')式中，等號右邊不變，讓等號左邊的 dK/K 一次性地轉變為 dP/P 。比如波蘭1989-1990年的價格改革，經過一次性的高通脹達到95%的價格放開^③。這種做法的缺點在於使人民的積蓄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政府要重建人民對本國貨幣的信心，非常不易。

另一類是上述(2')式中，通過縮小等號右邊 dM/M 與 dY/Y 這兩項之間的差距來消除貨幣過量，這樣放開價格管制時就不會出現高通脹。這裏，消除差距的辦法又有兩種：減少貨幣總量和發展生產。兩者相較，發展生產是根本之計，而減少貨幣總量若運用得當，亦能有效抑制高通脹。

目前，中國大陸基本上走發展生產的路線。1978年改革至今，雖然中國大陸沒能將國有企業民營化，但是卻允許私營經濟發展，結果是私營經濟從零發展到今天佔大陸經濟的半壁江山。正是主要靠私營經濟，才能使大陸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同時使得中國大陸這些年既能逐步放開價格，又能避免惡性通貨膨脹。當然，如果國有企業的問題不解決，將來依然會為患無窮^④。

反觀蘇聯在1991年實行的政策，是想用減少貨幣總量的辦法來消除貨幣過量。這種辦法有兩種方式：

方式之一是在降低 dM / M 的同時，保持物價和工資水平不變（即 $dP = 0$ ），從而降低 dK / K 。德國在1948和1990年的兩次貨幣改革中，都採用此法而成功消除了貨幣過量。例如在1990年4月的貨幣改革中，德東地區每人可按1：1的比率用東德馬克換取4,000西德馬克（15歲以下每人2,000，65歲以上每人6,000），其餘的存款按2:1換西德馬克。工資按1:1換為西德馬克；

方式之二是用新幣按同一比率更換所有舊幣。這時物價和工資水平（即 dP / P ）與 dM / M 同速下降，貨幣過量 dK / K （或者說通脹壓力）依然存在。而政府往往會採取措施用以建立人民對新幣的信心，刺激儲蓄，減輕通脹壓力，比如將新貨幣與黃金、美元、地產掛鉤，同時規定新幣發行上限等等。德國在1923年和台灣在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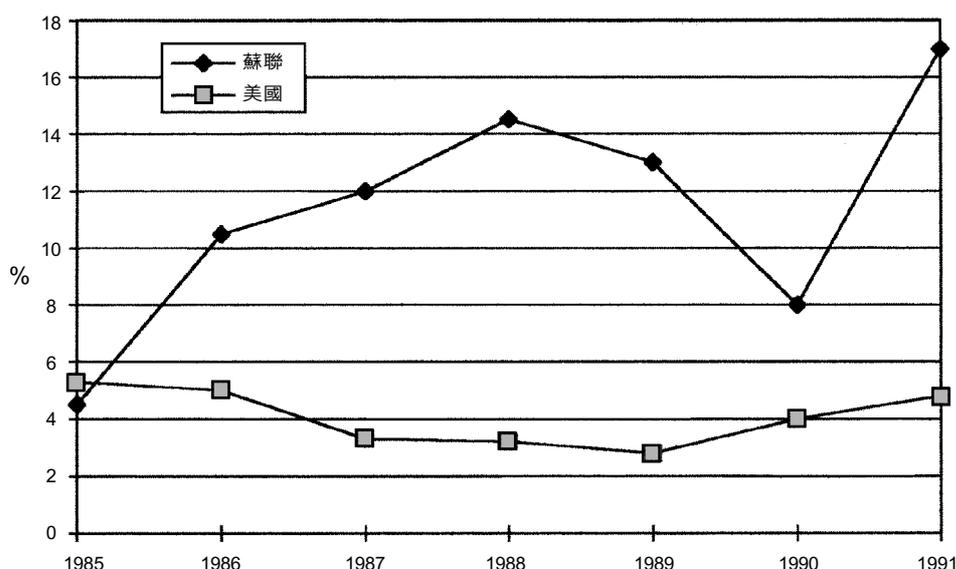
的貨幣改革都屬此方式⑤。

這裏應注意的是，無論採用何種方式，都是對全部舊幣而不僅僅是對其中一部分採取行動。

蘇聯為甚麼會在1991年面臨嚴重的貨幣存量問題呢？這主要是1985年以後蘇聯財政赤字猛增所造成的。眾人皆知美國在80年代創下巨額財政赤字，殊不知，按財政赤字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計算，蘇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見圖1）。由於美國主要是靠發行公債來融資，加上赤字佔GNP份額不大，所以對私人投資的排擠效應也不是很大。相反，蘇聯則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發鈔來融資赤字的，這就使得其貨幣發行量大大增加，惡化了貨幣過量的問題。據估算，1990年蘇聯的貨幣過量數額在2,550億盧布左右，其中約有1,700億在私人手中。1991年內又增加了至少1,320億盧布⑥。

1978年改革至今，中國大陸主要靠私營經濟，才能使大陸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同時使得中國大陸這些年既能逐步放開價格，又能避免惡性通貨膨脹。當然，如果國有企業的問題不解決，將來依然會為患無窮。

圖1 1985-1991年蘇美財政赤字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之比較



資料來源：蘇聯的數據見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轉引自Hans Schmidt, "Geld- und fiskalpolitische Aspekte des russischen Transformationsprozesses", in *Transformation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makroökonomische Konzepte und Fallstudien*, hrsg. Hansjög Herr and Andreas Westphal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3).

美國的數據見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94*, 144.

80年代後期蘇聯財政惡化的原因主要有⑦：(1) 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執政後，提出「加速發展戰略」(Perestroika)，不顧蘇聯長期忽視輕工業的產業結構問題，仍然把機械製造作為龍頭工業，結果因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無功而返，不僅浪費大量投資，而且造成日用消費品市場進一步緊張；(2) 1988年1月1日實施的企業法，重點不在明確產權，而在擴大自主權，結果國有企業在軟財政約束的條件下，上交稅利減少，職工收入卻不斷提高；(3) 因國際油價下跌引致外匯收入下降。此外，禁酒運動和稅收制度不健全等制度因素亦令財稅收入減少。

1990年蘇聯GNP呈現戰後首次的負增長(-2%)。5月間，政府的價格改革計劃被議會否決，但民眾的通脹預期心理已經形成，搶購風起，消費品市場全面短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開始着手貨幣改革，希望藉此消除貨幣過量。

由此可見，蘇聯政府在發展私營經濟並健全財政制度以前就進行價格改革，實是本末倒置。即使通過貨幣改革消除了貨幣過量，沒有通貨膨脹地放開了價格，也並不能使國有企業生產增長，而且不健全的財政制度不久又會造成新一輪的貨幣過量。更糟糕的是：蘇聯政府針對大額紙幣(或稱「母幣」)採取行動，根本達不到消除貨幣過量的目的。

如前所述，政府若是用一種新貨幣來取代盧布，就可以通過對銀行存款和工資採取不同比率的方法，來削減除工資外的貨幣存量。但是如果政府只是削減貨幣總量中的大額紙幣，則缺乏正當理由。大額紙幣，何罪之

有？把大額紙幣與地下經濟掛鉤只是一個極牽強的理由，而且，即使從這個莫須有的理由出發，也只會得出「與地下經濟無關的大額紙幣就應得到更換」的結論。所以，總統令中有規定，只要能證明來源合法，大額紙幣就能更換。而此門一開，政府則根本無法達到消除貨幣過量的目的。

結果是：首先，由於民怨沸騰，三天的期限被延為五天；其次，總額為482億盧布的大額紙幣中大部分都被更換，結果只有70-80億盧布的大額紙幣被取消，佔M1的1.5%⑧；最後，因為打擊地下經濟與銀行存款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在民眾要求下，對銀行取款的限制在2月份被取消。

我們可以說，這場貨幣改革最終摧毀的不是貨幣過量，而是公眾對盧布的信心：既然大額盧布不安全，銀行存款也不安全，那麼最安全的保值手段就是商品實物和外匯。這時，政府已經無法用提高利息來遏止通貨膨脹了。遺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不僅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比如公開承認此次貨幣政策的錯誤等)來恢復民眾對盧布的信心，相反還馬上於1991年4月進行價格改革。其結果可想而知：從1991年3月到12月26日蘇聯解體之日為止，其間的通膨率為220%⑨。

三 自殺還是他殺？

究竟是誰毀了蘇聯？是西方國家還是單穆公？其實，恰如蘇聯的國父列寧所指出的：毀滅一個國家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毀掉這個國家所使用的貨

究竟是誰毀了蘇聯？是西方國家還是單穆公？其實，恰如蘇聯的國父列寧所指出的：毀滅一個國家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毀掉這個國家所使用的貨幣。從這場貨幣改革即可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幣^⑩。從這場貨幣改革即可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註釋

① 世界銀行自1980年起對中國大陸貸款，自1993年起對俄羅斯貸款。從1992-1996年(世界銀行財政年度)中國大陸每年都是世界銀行的最大受款國。詳見 *Weltbank Jahresbericht 1996* (Washington: World Bank), 38; 1995, 39; 1994, 57; 1993, 173; 1992, 188; 1991, 172.

② 雖然學界對此事件的真偽有爭議，比如加藤繁：〈周景王鑄錢傳說批判〉，載《中國經濟史考證》，卷一(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頁18-25。但本文在此關心的是其思想之正誤。

③ 有關波蘭的價格改革，請參閱 Roman Frydman, Stanislaw Wellisz and Grzegorz W. Kolodko, "Stabilization Policies in Poland: A Progress Report", in *Exchange Rate Policies in Developing and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ed. Emil-Maria Claassen (San Francisco: ICG Press, 1991).

④ 國有企業的大量存在造成了貨幣需求的不穩定，而大陸央行為了支持國有企業亦無法堅持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貨幣供給亦難穩定，結果造成貨幣增長率大起大落，兩位數的通脹率頻繁出現，嚴重影響了人民幣對內幣值的穩定以及對外自由兌換的實現。詳見鄭驄：〈港幣還能活多久？——論人民幣、港幣、澳幣統一之路〉，《經濟前瞻》(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第11卷第4期，1996年7月。

⑤ 有關德國在1923年、1948年及1990年的三次貨幣改革，詳見 Hans-Joachim Jarchow, *Theorie und Politik des Geldes, 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95)，第1-2章；Emil-Maria Claassen, *Global Monetary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63-70。有關台灣在1949年的貨幣改革，詳見吳聰敏：〈台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載梁國樹編：《台灣經濟發展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⑥ 請參閱 Manfred Trapp, *Der dekretierte Markt: Die sozialistische Wirtschaftsordnung und ihre Transformation in der Sowjetunion und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1985-1992*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1994), 266.

⑦ 詳見 Petr O. Aven, "Experiences, Propects, and Policy Options: The Case of the USS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es*, ed. Horst Siebert (Tübingen: Mohr, 199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form issu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uropean Economy*, no. 49 (September 1993).

⑧ 請參閱註⑥書，頁270；註⑦書，頁233。

⑨ 1991年蘇聯M1的增長率為103.5%，M2的增長率為128.2%。詳見 Hans Schmidt, "Geld- und fiskalpolitische Aspekte des russischen Transformationsprozesses", in *Transformation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makroökonomische konzepte und Fallstudien*, hrsg. Hansjörg Herr and Andreas Westphal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3), 286-88.

⑩ Milton Friedman著，趙秋嚴譯：《資本主義與自由》(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32-33。

鄭驄 德國曼海姆大學經濟學博士
候選人